



歐盟網路內容監管新進程： 假訊息準則入法之後

◎ 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2025年7月1日，歐盟正式將《假訊息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on Disinformation）納入《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簡稱DSA）架構。這意味的是，這個原先自願性、自律性質的平台產業協議，今後將具有監管與稽核的法律強制效力。此一制度轉變，不僅象徵歐洲對數位治理與平台責任的重大轉

向，也引發一場關於審查與言論自由界線的跨大西洋論戰。¹

歐盟的數位民主防線：

從自律到共規

從2018年開始，歐盟即與大型科技平台合作推動《假訊息行為準則》，以因應

¹ <https://techpolicy.press/eu-disinformation-code-takes-effect-amid-censorship-claims-and-trade-tensions>



歐盟於2025年7月正式將《假訊息行為準則》納入《數位服務法》中，以因應假訊息及外國勢力操控輿論的威脅。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com

選舉干預、假訊息洪流及外國勢力操縱輿論等威脅。其初版內容，主要包含防止變現（demonetisation）、廣告透明度、服務誠信與使用者賦權等四大主軸。然而，COVID-19疫情與俄烏戰爭突顯此一自願性規範的局限性。而2022年版本（The Strengthened 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雖有所強化，但數位平台自願遵守的意願降低，X平台（原名

Twitter）甚至在馬斯克（Elon Musk）收購後全面退出。²

面對平台自律意願鬆動，歐盟開始主動加強法制化，最終在2025年2月獲得執委會與數位服務委員會的雙重認可，正式將準則轉化為《數位服務法》第45條下的「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並且作為第34與35條中「緩解系統性風險責任」的衡量標準。³

準則內容與承諾機制： 歐洲數位民主的路線圖

《假訊息行為準則》2022年經修訂強化的版本共涵蓋8個章節，45項具體承

² <https://techpolicy.press/the-eus-code-of-practice-on-disinformation-is-now-part-of-the-digital-services-act-what-does-it-mean>

³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code-conduct-disinformation>





歐盟於2018年5月正式實施的《通用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護，賦予個人更大的資料控制權，並規範企業如何收集、使用、儲存和處理個人資料。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com

諾，並建立三種評估與回饋工具：結構性指標（Structural Indicators）、服務層級指標（Service Level Indicators, SLIs）與量化報告元素（Quantitative Reporting Elements, QREs）。⁴ 其中的幾個核心承諾包括：

- 事實查核與外部協力（Chapter VII）：平台需與第三方事實查核組織合作，建立事實查核標準與回報機制。歐洲事實查核聯盟（European Fact-checking Standards Network, 簡稱 EFCSN）在其中扮演關鍵的監督角色。⁵
- 廣告與防止變現（Chapter II & III）：要求平台審查廣告配置，防止假訊息網站透過流量與點擊來變現獲利，並提高政治廣告透明度與來源識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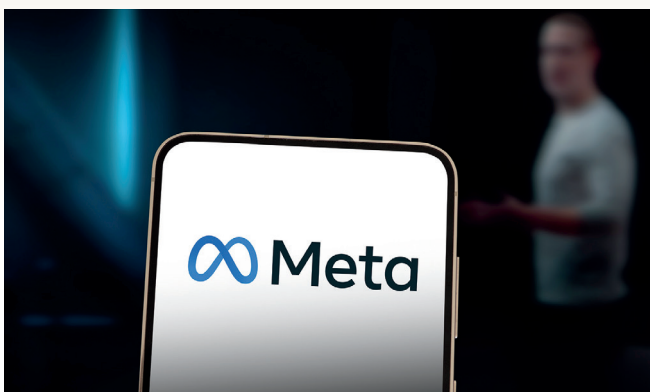
- 演算法透明度（Chapter IV）：要求揭露推薦系統運作原理、影響因素及使用者自行設定的機會，避免極端內容因點閱誘因而被系統性放大。
- 用戶賦權與媒體素養（Chapter V & VIII）：平台需提供用戶檢舉、申訴與救濟機制，並投資於媒體素養計畫與教育資源。

此外，《假訊息行為準則》建立了「常設工作小組」（Permanent Task-force），作為平台與民間公民社會組織、歐盟機構之間的協商與監督平台，並啟動快速應變系統（Rapid Response System, RRS），以因應選舉期間或危機事件中的資訊操控。⁶

4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code-conduct-disinformation>

5 <https://efcsn.com/>

6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code-conduct-disinformation>



《假訊息行為準則》入法後，也引發言論審查與各大數位平台的批評。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com

儘管架構完善，該準則仍面臨平台撤退與承諾打折的挑戰。在其2025年發布的最新報告中，總部位於柏林、致力於促進全球民主治理、選舉公正與法治發展的非政府組織「民主報導國際」（Democracy Reporting International，簡稱 DRI）指出，⁷ 自2022年以來，各大平台對準則承諾的履行程度下降了31%，特別是在政治廣告與事實查核領域。⁸

是審查還是責任？美國保守派與歐盟的不同立場

歐盟此一將《假訊息行為準則》納入《數位服務法》的政策，立即遭到美國國會共和黨人批評，尤其來自「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陣營的眾議員Jim Jordan，他擔憂這項政策會輸出並影響其他地區和國家，迫使美國平台必須同步進行全球性言論審查。⁹ Meta公共事務長Joel Kaplan也批評歐盟立法是針對美國科技公司「前所未有的攻擊」。



儘管歐盟執委會一再重申，《假訊息行為準則》並非審查制度，但「全球假訊息指數」執行長Clare Melford表示，「真正被壓抑的不是極端言論，而是中道理性聲音，因為它們無法創造足夠的點擊與利潤。」。Photo Credit: <https://www.flickr.com/photos/worldeconomicforum/7981731105/>, CC BY-SA 2.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21297733>

對此，歐盟執委會重申，《假訊息行為準則》並非審查制度，而是一套聚焦「透明度、責任機制與風險治理」的系統性對策，並非針對單一內容進行移除，其核心是打擊資訊操控、廣告操縱與推薦演算法的不透明，並非意在箝制多元言論。

正如「全球假訊息指數」（Global Disinformation Index，簡稱GDI）執行長Clare Melford所言：¹⁰「真正被壓抑的不是極端言論，而是中道理性聲音，因為它們無法創造足夠的點擊與利潤。」再者，審查與

⁷ <https://democracy-reporting.org/en/office/global>

⁸ <https://www.techpolicy.press/the-eus-code-of-practice-on-disinformation-is-now-part-of-the-digital-services-act-what-does-it-mean/>

⁹ <https://techpolicy.press/eu-disinformation-code-takes-effect-amid-censorship-claims-and-trade-tensions>

¹⁰ <https://www.disinformationindex.org/>

表達自由之間的界線，不能由平台單方面決定，而需透過公正、透明、負責的制度共治。

稽核能否落實？從行政程序到民主治理的挑戰

《假訊息行為準則》被正式納入《數位服務法》後，已成為稽核機制的核心要件。數位平台在歐洲每年必須接受獨立稽核，由具備新聞、法律、平台演算法專業的外部團隊執行。¹¹ 但目前稽核制度仍面臨專業人力短缺、審查標準未統一與資料存取困難等結構性瓶頸。

此外，平台在多國報告的透明度不一，部分成員國缺乏資料或區域性指標，導致整體報告難以比較。¹² 歐洲數位媒體觀察站（EDMO）呼籲平台應統一資料格式與區域報告層級，並提供第三方研究人員必要存取權。

從制度願景到政治現實：歐盟監管的瓶頸與出路

誠如「歐洲監管機關平台」（European Platform of Regulatory Authorities, 簡稱EPRA）副主席Stanislav Matejka所言，¹³ 《假訊息行為準則》與《數位服務法》的

整合是「試圖以具體的KPI框架與透明機制，為平台風險治理創建衡量標準」。¹⁴ 這既是展現歐洲平台治理的決心，也是一場關於數位民主的制度性實驗。

然而，制度終究需要落實。歐盟若無法有效整合平台、稽核、事實查核與民間參與的各種資源與權責分配，將難以建構真正具韌性的數位公共空間。正如丹麥媒體專家Colette Wahlqvist指出：「當我們本該慶祝這項制度轉型時，平台的不合作態度與承諾縮水卻成為最陰沉的現實。」

雖然歐盟展現高度制度創新與治理企圖，但從願景走向落實，依然面臨三大挑戰：

首先是監管執行力的落差。如同歐盟數位服務委員會所言，各國數位服務協調單位（Digital Services Coordinators）缺乏足夠資源或技術能力，尚難有效監督超大型線上平台（Very Large Online Platforms, VLOPs）與超大型線上搜尋引擎（Very Large Online Search Engines, VLOSEs）的年度稽核，尤其在語言多元與平台複雜生態下，各國監管機構容易成為平台策略性拖延或遊說的對象。¹⁵ 換言之，即使準則設計再精細，若缺乏橫向資訊共享與監督連動，終將流於「紙上透明，實質黑箱」。

11 https://rpms.sk/sites/default/files/2025-02/Conclusions_of_the_Board__Code_of_Conduct_Disinformation.pdf

12 https://rpms.sk/sites/default/files/2025-02/Conclusions_of_the_Board__Code_of_Conduct_Disinformation.pdf

13 <https://www.epra.org/>

14 <https://techpolicy.press/the-eus-code-of-practice-on-disinformation-is-now-part-of-the-digital-services-act-what-does-it-mean>

15 https://rpms.sk/sites/default/files/2025-02/Conclusions_of_the_Board__Code_of_Conduct_Disinformation.pdf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com



第二個挑戰是平台「策略性承諾撤退」現象。儘管準則簽署形式自願，但一旦其被視為是否符合《數位服務法》法遵合規義務的重要依據，數位平台企業退出或未履行承諾也將成為一種談判籌碼。例如Google與Microsoft退出政治廣告透明度專章、Meta大幅減少事實查核合作，皆可視為對歐盟「超國家監管」的不服從與抵制。¹⁶

第三是來自第三國的政治壓力。美國政府已明言反對歐盟輸出「全球審查標準」，甚至藉由川普政府重啟的貿易談判，施壓加拿大撤回數位服務稅。¹⁷若川普強化對歐洲科技規則的報復措施，勢必將重創歐盟的監理正當性與制度輸出潛力。

面對內外壓力與審查爭議，歐盟應進一步深化與公民社會及事實查核機構的協力治理。以目前獲歐盟資助的歐洲事實查核標準聯盟（EFCSN）與歐洲數位媒體觀察站（European Digital Media Observatory，

EDMO）為例，這些組織正逐步成為制度落實與風險監管的中介支點。唯有建構一套多層次、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的治理架構，歐盟數位監管才能擺脫自上而下、官僚導向的施政侷限，轉化為一種真正體現民主精神、公民參與與科技問責的協作型制度模式。

歐盟將《假訊息行為準則》納入《數位服務法》體系的經驗，或許正可作為臺灣制度創新的重要參照。當前，臺灣在平台治理仍主要依賴企業自律，缺乏法定稽核機制、透明標準、事實查核協作框架與公民社會參與機制的整體架構。若欲提升對假訊息與平台失職的民主韌性，臺灣勢必需要超越信賴自律的階段，走向具有監督性、參與性與制度性的數位公共治理新模式。

¹⁶ <https://techpolicy.press/the-eus-code-of-practice-on-disinformation-is-now-part-of-the-digital-services-act-what-does-it-mean>

¹⁷ <https://techpolicy.press/eu-disinformation-code-takes-effect-amid-censorship-claims-and-trade-tensions>

韓美關係再深化？ 從駐韓美軍移防可能性談起

◎ 盧信吉／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美國《華爾街日報》近期引述美國智庫建議駐韓美軍移防關島或印太據點之報導，究其原因應多與韓國由李在明當選新任總統之美中政策立場恐有明確轉變有關，本文將就當代地緣政治以及區域安全角度，來探究韓美關係未來演變可能。

前言

美國時間2025年5月23日，《華爾街日報》報導引述國防部官員說法，川普政府正考慮將4,500名駐韓美軍移防至關島或印太區域內據點。¹ 事後雖經國防部發言

¹ Nancy A. Youssef, Alexander Ward and Timothy W. Martin, "U.S. Considers Withdrawing Thousands of Troops From South Kore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3, 2025, https://www.wsj.com/world/asia/u-s-considers-withdrawing-thousands-of-troops-from-south-korea-725a6514?gaa_at=eafs&gaa_n=ASWzDAildhLoRF72tbhOpWSZ8EmER5HYDKLSFrME_9UCSc3jQEn8oAi_Mco&gaa_sig=NyQOsKwxhPFzktEm0x4iylSwWUs6gw0ucwo7FuADODHKAG00gCZOD0tLbalHOZFfs41azAOBeNjW5uz5c0FkQ%3D%3D&gaa_ts=687863b1&utm_source=chatgpt.com





人證實該提案僅為智庫所建議，尚未成為既定政策，但仍對多事之秋的朝鮮半島拋下震撼彈。首先，韓國內部經重新選舉，在野黨領袖李在明甫宣誓就職，尚未真正說明韓國對美政策將如何調整，且未與川普政府對接雙方認知，美國智庫的提案將成為李在明政府對美政策的外部壓力；其次，自拜登政府以來，韓國國情對於來自北方核武與中國經貿威脅的感受日漸明顯，民眾期盼透過擁有核武自我保護的聲浪日益高漲，韓國民眾認知上的恐慌，則成為朝鮮半島的內部壓力來源；更重要的是，對韓國而言，韓美關係能否維持穩定，關鍵在於駐韓美軍所提供的威懾能力。一旦美國嘗試移防或退居關島，將成為美軍勢力在印太地區逐步撤離徵兆，對於當前印太地區的所有盟國而言，不啻為



於2025年6月4日甫宣誓就職的韓國總統李在明。

Photo Credit: 由 Republic of Korea from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21th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Korea, CC BY-SA 2.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66853267>

一項劃時代的警鐘，也是韓美關係能否持續深化的結構性壓力根源。

轉變的當代地緣政治理論——我退不等於敵進

傳統的地緣政治理論講求地理條件對政治決策的重要性，特別是國家存在要素中的「領土」概念，是零和賽局中無法共享的資源，也是地緣政治理論闡述國家安全維護的重要依據。因此過去必須動用大量資源發動戰爭，才能夠爭取分寸之地，乃是傳統地緣政治理論能夠長存決策者心中難以抹滅的原因。當前，美國智庫的提議將讓駐韓美軍來到韓戰後的新低，將讓信仰傳統地緣政治理論價值者陷入恐慌，憂慮是否影響韓國國家安危。

檢視歷史發展，駐韓美軍曾分別在幾個重大事件後，逐步縮減駐軍人數：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com

一、1960年韓戰協議停火兩年後：因局勢發展穩定，艾森豪政府將駐韓美軍人數削減至5.5萬人。

二、關島協議（尼克森主義）：尼克森政府1971年開始呼籲盟國承擔更大的軍事國防支出，在關島協議完成後撤出了美國第七步兵師，讓人數下降到約4萬人。

三、「911」恐怖攻擊事件：布希政府被迫將一個武裝旅調往伊拉克安巴爾省作戰，讓2005年的駐韓美軍數量再次調整到約3萬人。

一旦美國智庫建議被川普政府採用，駐韓美軍人數將降至2萬人以下，將成為

美國撤出二戰後軍事佔領區的新階段，其駐韓美軍數量成為歷史新低，遙相呼應1977年時任總統候選人卡特所主張的，撤出所有駐韓美軍。²但逐步的削減駐韓美軍數量，難以說服所有印太地區的盟國，美國的戰略規劃仍是一個「有能力、有意願」的霸權國。

² Victor Cha, "The Meaning of U.S. Troop Withdrawals from Kore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2,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meaning-us-troop-withdrawals-korea?utm_source=chatgpt.com.



如同過去幾任美國總統，在考量局勢穩定、削減軍事支出和盟國承擔防衛責任，乃至於其他更重要戰略任務的時機，都有調整駐韓美軍數量的全盤衡量；但或許更現實的思考應該是，當前美國更需要區域內的盟國承擔起共同防衛的重要任務時，韓美關係是否就難以維繫？綜觀智庫的建議，是否將成為美國調整其印太戰略重心的過程，也或將成為韓美關係能否再深化的關鍵時刻。

進步黨（派）政府的務實外交政策

韓美關係無疑是韓國對外政策最重要的優先選項，與媒體所稱進步黨（派）親中的政治傾向相比，所有的韓國政府都難以避免重視與美關係先於對中關係。所以雖然李在明政府的對外政策尚未清楚公諸於文字與外交語言中，但可以理解其對美關係的界線，仍難以脫離當前韓美



關係結構穩定發展的社會成本。美國智庫的倡議雖造成一片譁然，但無論韓國哪個黨派的領導人，其實都難以承擔脫離美國軍事聯盟的壓力，因此李在明政府也恐難以違抗民眾的認知，扭轉政府外交政策走向。

具體而言，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軸，定位為「務實導向、國家利益優先」，試圖突破過去執政黨依情感或意識形態的外交模式，建立更穩健且自主的對外政策方向；李在明亦曾表明新政府將推行「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自主均衡外交」，強調實用主義，根據現實利益制定外交策略。德國之聲報導認為，李在明不會採取無把握的偏頗親美或親中等極端立場，反映其務實傾向；卡內基政策研究所則指出，李致



力推動多元夥伴關係，以突破過往過於倚重美國的格局，強調平衡與策略自主。

這樣的外交原則與過去的保守黨（派）相比，更為細膩地操作韓國在美中戰略競爭的狀態下能夠掌握的政策論述機會。過去韓國關注因其受到北方威脅，因此必須更在意與哪方陣營合作，能獲取更多的安全承諾與保障，進而陷入另外一個零和賽局之中。親近美國獲得的間接軍事保護，對比親近中國才能掌握對北韓的談判契機，在幾次的政黨輪替考驗後，都顯有瑕疵，沒有任何一個立場能夠提供韓國完整的國家安全，回歸韓國本身對政策的現實考量，將迫使其對外關係接觸的所有國家，都須提供更具現實承諾的外交互動模式。

無論如何，韓國李在明政府上台之後，韓美關係必然需要進入重整期。對於美國川普政府而言，駐韓美軍不僅只是美國提供韓國安全保障的具體作為，更是美國對於周遭印太盟國安全承諾的多重選項：一個能夠移防且支援多元任務挑戰的美國軍事武裝力量，在當前的印太環境中

是受到歡迎的，這將使得美國在重塑美韓關係上占據戰略的優勢。換言之，李在明政府在倘若不能也沒有拋棄與美國合作的意願前提下，談判空間或許僅剩嘗試在美國提供的安全選項內，尋找一項雙方共認且更貼近現有安全承諾與維護的方案。維持既有的駐韓美軍規模以及駐守地點，將是如此的務實模式中一個變動最小的選項。

追根究柢，駐韓美軍移防的倡議出自於美國智庫，其衡量的變數在於美國是否需要回應印太地區其他國家對其安全承諾的挑戰。將部分駐韓美軍退居關島防線，將使美國的調動更具靈活性。但也如同美國駐韓司令所言：「韓國是不沉的航空母艦」，這顯示韓國在朝鮮半島的戰略地位，能夠派防駐軍掐住戰略高地，將使美國具備戰略主動的優勢。對於韓國而言，即便需要更多的軍費支出，但能夠與過去相同獲得完整的承諾與保障，乃是李在明政府需要的「務實外交成果」，與失去美國駐軍人數的選項相比高下立判。因此，韓美關係再深化的態勢儼然成形，但能否真正達成協議，僅剩韓國如何據此作出價值決斷。李在明的務實外交說，給予韓美雙方一個評斷的標準，如何達到「駐韓美軍係韓美同盟核心戰力，其與韓軍堅定不移地保持聯合防衛態勢，遏制北朝鮮侵略和挑釁行為，為維護朝鮮半島與區域和平與穩定有所貢獻。」的政策宣示，乃是韓美關係是否能夠再深化的務實考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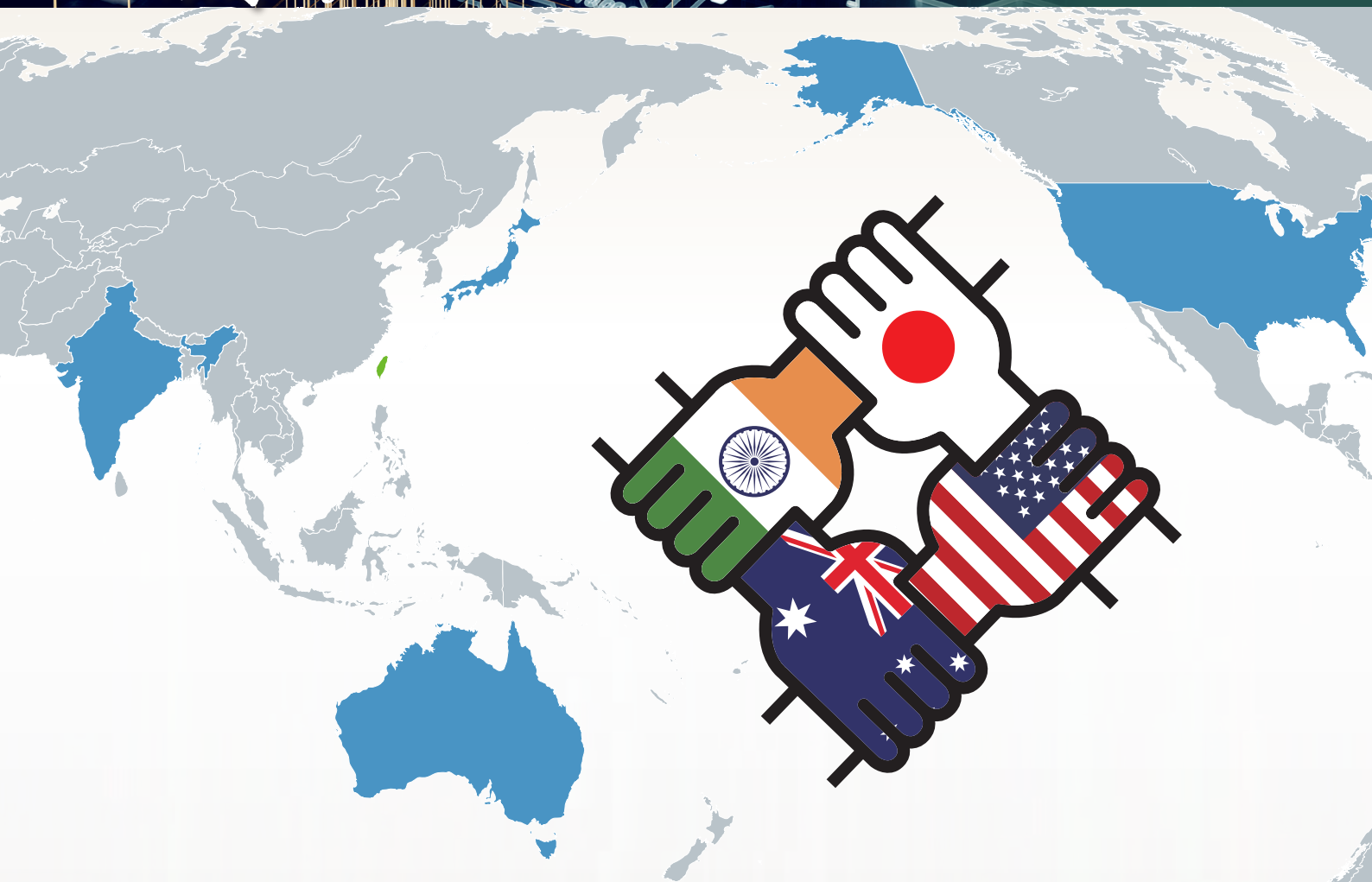
爭取QUAD借力使力： 印太安全戰略下 臺灣的地緣角色

◎ 林士清／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博士

在大國地緣政治博弈中，緩衝國具有敏感戰略位置，臺灣位於美國西太平洋防衛的第一島鏈，作為美國和中國在亞太地區的關鍵戰略交匯點。倘若對岸依舊持續加強對臺軍事壓力，兩岸則會陷入軍事威脅與區域衝突風險，我方需思索如何透過QUAD（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四方安全對話）阻止對岸在軍事、外交、經貿、科技等領域步步入侵，以降低臺海危機的風險。

QUAD 從概念到機制：為因應中國在印太的政治崛起、軍事威脅、經貿擴張

QUAD是由美國、日本、澳洲和印度一組成的非正式戰略論壇，其主要目的是加強這4個國家之間的合作，提升區域安全與穩定，並抑制中國崛起造成對印太區域地緣政治的威脅。事實上，QUAD的初始概念，源於2004年印度洋大海嘯後，這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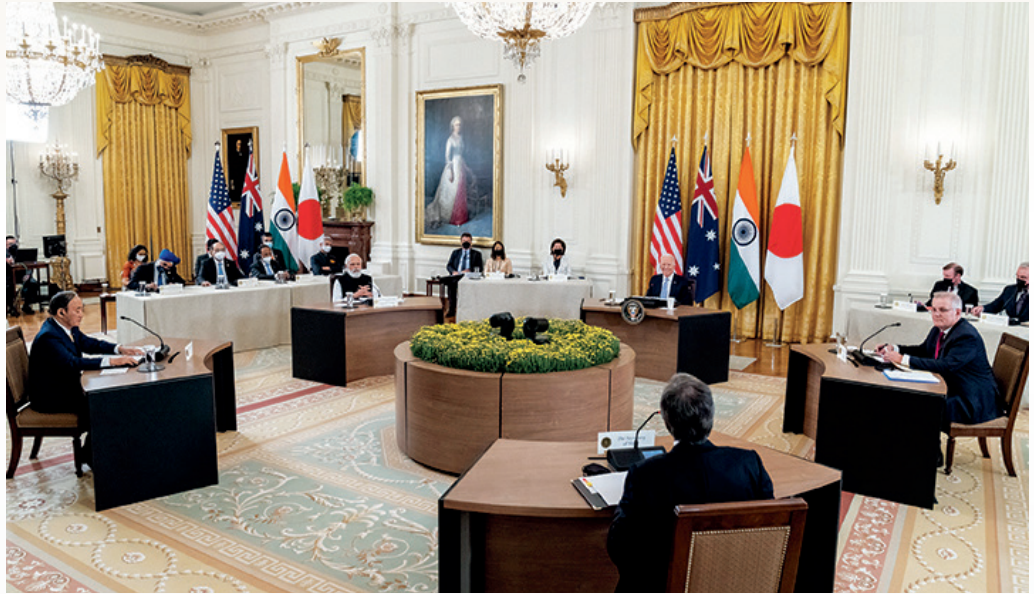


個國家出於人道主義考量共同合作，提供災後援助。隨著時間推進，四國之間的合作逐漸深化，並開始關注亞太地區的安全問題。2007年，QUAD第一次正式召開，並開始討論區域安全問題。

回顧QUAD成立的波折，由於當時的印度政府對過於明確對抗中國的立場持保留態度，QUAD在2008年曾一度停擺。直至2017年，中國崛起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日

益增強，四國再次啟動QUAD合作，並將其目標擴展至包括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維護區域安全等更為廣泛的議題，強調民主價值觀和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當前QUAD儼然已成為一個多層次的安全與經濟合作平台，涵蓋了軍事、經濟、科技、網絡安全等領域。

近年來，QUAD的合作範疇持續擴大，特別是在應對中國崛起及其在亞太地



2021年9月24日，四方安全對話首次領袖面對面高峰會於美國白宮召開。 Photo Source: Biden White House Archived 製作,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ork

區的影響力方面。2021年，四國領袖首次舉行了面對面的會議，並共同發表聲明，強調推動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並透過國際建制的合作以共同因應如戰爭風險、氣候變遷及全球公共衛生等問題。儘管QUAD並非單純為了遏制中國而成立，但它的存在和運作的確對中國崛起形成了一定的戰略制衡，QUAD合作機制越來越明顯地聚焦於應對中國在政治、軍事、貿易等領域的擴張行為，包含：南海爭端、臺海問題、一帶一路倡議等方面，中國的行為成為QUAD關注的核心議題。

美、日、印、澳等四國政治領袖對 QUAD 運作機制有默契

QUAD定期舉行高層會議，並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特別是在海上安全和反恐等

領域，QUAD甚至通過共同宣誓支持自由開放的海洋秩序，反對中國在南海的強行主權主張，並強調需要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尤甚，探討美國、日本、澳洲及印度等4國最高政治領導者，對QUAD國際合作機制的立場與支持甚為關鍵：

-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認為QUAD是作為印太地區重要的地緣政治框架。檢視川普任期內具有強烈推動「美國優先」政策，並對多邊合作持較為保守的態度。然而，川普政府多次強調QUAD的多邊合作將有助於促進區域穩定。川普在任內重視與印度、澳洲和日本的合作，小心翼翼地防範中國在印太區域影響力的擴張，其多次強調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是美

國的戰略重心之一，而QUAD具有重要抑制中國擴張的戰略意義。

- 日本首相石破茂（Shigeru Ishiba）對QUAD的支持可能更加強烈。石破茂作為日本政壇內堅定的保守派領袖，強調加強日本在區域安全和軍事防禦方面的作用。對於QUAD，他可能會更積極推動四國合作，尤其在應對中國的軍事擴張和南海爭端方面。石破茂曾對外表示：日本必須積極參與維護區域和平與穩定，而QUAD正是一個關鍵平台，有助於日本與美國、印度、澳洲共同應對中國的挑戰。此外，石破茂主張強化日本的自衛能力，並加強與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的安全合作。
-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認為澳洲勢必在QUAD中扮演政治及軍事的重要角色。阿爾巴尼斯強調澳洲支持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並且強烈支持QUAD作為對抗中國擴張的多邊框架。他認同QUAD的合作機制對確保區域安全、促進氣候行動等方面的重要性，繼續延續此一合作

機制能夠加強區域安全，並推動多邊主義和規則基礎的國際秩序。澳洲對中國在南海和印太地區的軍事擴張深感關切，並視QUAD為應對中國挑戰的重要工具。

- 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將QUAD視為確保印度在印太地區影響力的關鍵平台。印度希望通過QUAD增強與美國、澳洲和日本的合作，尤其是在防範中國擴張的背景下。印度積極參與QUAD的軍事演習、外交會議，並將其視為確保印度太平洋地區和平穩定的戰略工具。即便有來自俄羅斯的政治壓力，但莫迪在公開場合多次強調：QUAD不僅是對抗中國在此區域軍事擴張的工具，更應該成為促進區域穩定、增進全球合作的重要平台。

印太安全戰略下臺灣的地緣角色

QUAD對抗中國的軍事與經濟影響力提供了一個共同應對的框架，成為區域安全的關鍵因素，臺灣作為印太地區的關鍵



戰略位置，對QUAD成員國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我國目前正面臨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和政治施壓，而QUAD則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幫助臺灣維護區域安全，避免臺海危機的爆發有以下意義：

首先，加強外交支持：日本、美國、澳洲及印度等QUAD成員國，經常透過雙邊及多邊等國際合作機制，強調包含臺海地區的印太區域內需堅持自由與民主，我國可藉此增強國際支持，減少中國孤立臺灣的可能性。

再者，提升軍事合作與聯繫：QUAD成員國的軍事合作有助於我國的防衛能力，尤其是在反制中國軍事威脅方面。QUAD定期進行聯合軍事演習，這些演習通常涵蓋海上安全、反恐和人道援助等議題，可加強我國在海上安全、反空襲、網絡防禦等領域的防衛能力。

第三，促進全球衛生與經貿合作：我國在科技、製造業（特別是半導體產業）等領域的強大實力，可以與QUAD成員國合作，在經貿與科技領域推動共同發展，提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com

升我國在國際供應鏈中的地位，並使臺灣在國際事務中擁有更多話語權。

最後，區域安全合作與軍事聯盟：雖然QUAD並非單純為了臺灣的安全而成立，但我國可通過加強與QUAD的合作，提升區域安全保障，同時基於QUAD的存在，提供我國在面對對岸軍事威脅和外交孤立時，更多的國際支持與合作機會。 ●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com